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现状

周银银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新世纪以来,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吸引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论者以书写内容、介入方式、叙事困境为支点,分析了不同作家的现实书写,研究视点和评论方法逐渐多元化;但面对“介入现实”这一宏阔命题,现有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亟待从“史学”视野、作家现实观的更迭、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寻找新的学术突破点。

[关键词]新世纪小说;介入现实;叙事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4-0063-08

Current Status of Novels Intervening into Chinese Reality in the New Century

ZHOU Yin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constantly emerging novels intervening into Chinese reality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commentators. They analyzed different reality writing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ubject matter, ways of intervening and narrative dilemma. Perspectives of study and methods of comment developed diversely. While,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should look for new academic breakthrough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historical vision, change of writers' realistic view, public life writing poetic justice of and novels, three-levels of Satre's intervention view and literary ideal.

Key words: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intervening into reality; narrative dilemma

无论是文学批评领域还是创作领域,文学如何表现现实,都是一个重要论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由于多种非文学性或文学性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文学对现实有着或强或弱、或远或近的不同言说。从新时期以降的小说生态来看,在“伤痕”“反思”“改革”小说阶段,当代文学即开始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回归,但随着 1985 年、1986 年“文学主体性”“文学向内转”等口号的提出,“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以破竹之势崛起,文学逐渐放弃了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新写实小说”掀起一股浪潮,它们与当下现实保持近距离接触,不遗余力地展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境况,在叙述姿态上标榜“原生态”“零度介入”;然而,失去了价值立场和情感取向的写作,小说还有什么内在灵魂可言呢?“新写实小说”降下帷幕之后,以何申、谈歌、关仁山为代表的“三驾马车”扛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构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从题材而言,这类小说的确持有对“现实”的介入态度,彰显了现实情怀,但问题是:当他们暴露了种种社会黑暗后,却并未对丑恶现象

收稿日期:2017-02-2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介入性与公共性问题研究”(16ZWB009);南京师范大学 2016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资助计划(YXXT16_001)

作者简介:周银银(1990-),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背后的本质予以严肃的廓清和深刻的批判。最终,这股潮流在“离弃现实主义批判使命”的质疑声中偃旗息鼓。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迈向了高速发展和急速变化的时期,现实呈现出泥沙俱下、光怪陆离的景观,它牵扯着众多作家的心绪,呼唤他们向现实回归,以强劲的主体立场去介入和书写自己所处的时代。于是,我们看到,较之新世纪以前,作家直面中国当下现实的倾向更加突出。他们正视社会矛盾和冲突,聚焦近20年来在当下中国发生并引起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或民族公共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短篇小说繁荣之后,“回到当下现实,关注社会生存的焦点”再度成为长篇小说竞相书写的话题,由此诞生了《蛙》《炸裂志》《极花》《第七天》《春尽江南》《耶路撒冷》《天体悬浮》《西洲曲》等精品佳作。

这些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便吸引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和青睐,在探索与争鸣中,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拟从书写内容、介入方式、意义与限度几方面对此类小说的研究现状逐一梳理,并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指瑕,试图从“史学”视野、作家现实观的更迭、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发掘新的学术突破点。

一 介入什么:主题内容研究

中国当下的现实繁杂多变,对此,作家深感迷茫和焦虑。这番焦虑促使他们提笔发言,朝着现实艰难跋涉,一步步展开对民族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话题的追问。研究者们对作家高度介入“中国现实”的姿态普遍表示了欣赏。於可训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述评》^[1]中敏锐地发现新世纪长篇小说“视点下沉”的趋势,并从书写上层官场风云、关注下层弱势群体等层面由衷地赞叹它们“更加切近当下中国的生活实际,也更显现实主义的艺术深度”。贺绍俊的《新世纪十年长篇小说四论》^[2]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新生了一种“拥抱现实的冲动”,长篇小说彰显出了“现实主义叙事的开放姿态”。文章以曹征路、阎连科、徐坤、莫言等作家为例,从主题内容、作家认知世界的方式、作家叙述能力等向度剖析,肯定他们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的创作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其宏观为主、微观为辅的分析模式值得借鉴,但限

于篇幅,他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不够饱满。

“中国现实”本身较为泛化,也并非固定不变,在某些公共事件频发的年份,介入现实的长篇小说会随之大规模涌现,对此,研究者和批评家们也怀着一种热情对其主题内容进行了跟踪研究。白烨的《雄浑的现实交响曲——2005年长篇小说巡礼》^[3]对2005年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势进行了宏观分析,认为小说“在观照现实和看取生活上,视角更为切实,视野普遍下沉”。文章以“乡土谣”“平民谱”“成长颂”三个主题为基点,剖析了《秦腔》《平原》《兄弟》《遍地枭雄》等作品的内容,并指出长篇小说这种“不断走来和明显走近的趋势”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如何必要,怎样重要,则语焉不详。其实,随着2004年“底层文学”思潮的兴起,精英作家们纷纷视野下移,所以2005年才贡献了诸多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葛红兵、许道军的《介入·深入·反思——2008年文坛热点问题述评》^[4]对2008年的文坛热点问题进行了宏观扫描,发现此年的小说对雪灾、震灾、奥运等重大时事进行了及时回应,同时继续打探底层、官场和高校生活,使得2008年的文学彰显出“现实的批判”精神,是“有深度的文学”。于中国来说,2008年是多事之秋,文学也确实强势回应并介入了这些现实,但是,论者对这类小说的肯定太过于固守在内容意蕴层面,对小说如何介入现实以及作家介入的能力并未给予深刻有力的阐释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名篇佳作联袂而至的2013年,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小说中的“现实”二字,各抒己见。代表成果有白烨的《2013年长篇小说:直面新现实讲述新故事》^[5],岳雯的《2013年长篇小说:“现实”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6]。其中,2013年前后,随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口号的提出,“中国故事”越来越受到当代作家的青睐,其中不乏某些作家追赶时代潮流的心理,但从真正具有文学力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来看,大多昭示了当代作家对现实的关切之心和忧虑之情。他们怀揣悲悯情怀和公共关怀,在对现实的体悟中关注民瘼、同情弱者,并以个性化的文学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来看,贾平凹、阎连科、莫言、余华等作家对“中国现实”流露出了极度的热情和关心,研究者就他们对现实的诘问进行了评析。王春林在《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与表现——贾平

凹新世纪长篇小说主题论》^[7]一文中对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五部长篇小说进行了细读,从男女爱情、生态环境、城市化浪潮下的乡村农民及农民打工者等维度剖析了贾平凹的书写内容,最终指向的命题是“贾平凹对‘中国问题’的关切”。论者在解析这5部小说时不是孤立开来,而是积极探索贾平凹在每一部作品中的新变,并发掘了作家现实观的嬗变:从“对乡村社会的启蒙干预”到“对乡村社会启蒙失望”,从而只作“客观的呈示与展现”。这种对作家现实观的求索是积极而必要的,因为在复杂的现实中,作家的理想、文学观以及现实情怀并非一成不变,研究者应从多个维度来理性探求这个问题,发现作家现实观的更迭如何主导了其现实书写。周蕾的《见证“疼痛”的写作——论余华笔下的“中国故事”》在余华30年创作的链条上分析了《兄弟》和《第七天》,指出余华小说的着力点已从“‘文革’中国的‘疼痛’”转向“‘改革’中国的‘疼痛’”^[8],对余华“正面强攻现实”的宏愿表示了肯定。

对于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书写内容的定位,研究者们大致趋于统一,且普遍赞誉了这番“向着火跑”的写作;不过,部分研究过于拘泥于内容层面,缺乏对作家精神姿态的探析。

二 如何介入:介入方式研究

面对中国社会一团乱麻般的境况,大批对现实怀着深度关切之心的作家实际上都处于茫然和焦灼之中。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告诫他们不能沉沦在个人化的小资小调中,而应去体察生活,烛照时代的黑暗和荒诞,从而对现实质询,并做出价值判断。但是,“如何介入,怎样书写时代症结”才能掷地有声又别具一格,这是横亘在每个作家心头的问题。根据他们奉献出的小说文本,评论者在赞誉作家介入“中国现实”的勇气之际,还从叙事学层面对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进行了孜孜探求。虽然对这一问题采用全景式扫描的论者较少,成果也参差不齐,但陈思和的《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9]与朱水涌的《从现实“症结”介入现实——以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近年创作为例》^[10]二文学术价值颇高。陈思和以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为例,探讨了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向:自然的现实主义与怪诞的现实主义。论者以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

把这两种书写现实的方法放置到中外文学史的坐标系中进行了回溯性考察,并将目光聚焦于贾平凹和沈从文、《兄弟》和《阿Q正传》的比较。对于曾经“毁”大于“誉”的《兄弟》,陈思和从余华介入现实的方式及隐含的价值立场出发,发现“余华的嘻嘻哈哈里面,恰恰藏了一种鲁迅的精神”,这可谓在给《兄弟》正名。其分析有理有据,援引的例证恰到好处,通篇显示出论者深邃通达的视域和独立理性的批评精神。其实,众多论者在品评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时,通常只站在文本意蕴的角度考问作家介入的效果如何,而不对作家如此介入的动机进行挖掘。殊不知,作家选择介入现实的方式必定承载着他的某种思想和情怀。从这一层面看,陈思和的文章为研究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提供了另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朱文曾单刀直入,率先反驳了“当下小说失却了介入现实能力”这一观点,认为当下小说是“以微妙的叙事变动,表现出文学介入现实新的姿态和方式,呼应着现代性特殊遭遇中中国现实的‘症结’”;继而以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三人介入现实的方法来支持其立论:王安忆从中心与边缘间的裂缝中介入、毕飞宇在城与乡的裂缝中想象、阎连科介于荒诞与现实之间的吊诡进行极端书写。论者在缕析三位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概括出他们介入现实的方式,分析精准,阐释令人信服。不足之处在于论者虽有意联系作家的文学观与个人经历探问介入之因,然而,仅是只言片语,大量笔墨仍停留在了文本内容的解读上。徐阿兵的《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事件化”倾向》^[11]概括出了极具事件化倾向的小说存在的三种结构:对立式结构、编织式结构、封闭式结构,并对此进行针砭,指出这些结构存在缺陷的病根在于“当前叙事资源的匮乏”。笔者认为,当前叙事资源非但不匮乏,且光怪陆离、斑驳复杂,之所以在结构和创作思维上出现雷同、复制成风的现象,仍导因于作家思想上的惰性和对生活本身缺乏观察、整合的能力。

除了以上相对完整的专文论述,还有大量博硕士论文和单篇论文从介入方式这一维度对先锋作家以及范小青、阎连科等人介入“中国现实”的小说进行了勘探和品评,探讨成果虽不成系统,但不乏真知灼见。

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实验过后,先锋作家开始回归现实,且在90年代和新世纪两度发生“变法”,这使得他们的现实写作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学

现象,不少博硕士论文都对此问题表示出了莫大的兴趣。比如王琮的《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以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12]、郑莎莎的《华丽的先锋到朴素现实:毕飞宇小说论》^[13],从先锋作家笔下的故事内容、写作策略、人物形象出发,发现了包裹其中的“现实”元素。当然,对先锋作家在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研究仍有挖掘空间。先锋作家的转型自90年代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就已开始,新世纪以来,他们对现实的书写是承续90年代对传统和现实的回归,那么,先锋作家在这一阶段的现实书写较之于90年代的转型有哪些深化?随着洪峰、马原、格非等人近年的集体回归,他们在新世纪和现实构成了何种关系,具有哪番现实情怀?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挖掘。

范小青、贾平凹、杨少衡、王跃文等人对“中国现实”始终保持着高度介入的热情,研究者对他们处理现实的方式进行了评析。韩松刚的《现实的“表情”——论范小青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写作》^[14]考察了范小青新世纪的小说,认为“范小青对于‘现实’的观察和体验,为这个时代留下了诸多现实的‘表情’”。他还洞察到这一时期“城市”成为范小青写作中最大的突破。除此,论者向纵深处挖掘,发现了范小青持有的诗性的苏州情怀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博弈,探索了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不是赤裸裸的枯燥呈现和怒目指责,而是恪守着小说最基本的表现美学,诗意成为她的一大特点。韩松刚在品鉴范小青如何介入现实时把地域文化纳入进来,在理性的叙述中发表独到深刻的见解。傅书华的《卑微人生的关注——读王祥夫的新世纪小说》^[15]和伍丹的《“常人”化生存下的人性书写——论王跃文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16]也深入探讨了专注于官场或底层写作的作家如何对现实发言。这类研究成果颇多,不足在于局限于某个作家,缺少了宏观比照,作家介入现实的独特性难以最大程度地凸显出来。

研究者们对《蛙》《黄雀记》《第七天》《炸裂志》《纠缠》等名篇叙述策略的分析也屡见不鲜。徐勇的《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17]紧扣《黄雀记》介入现实的方式——“象征”,对其做了精辟深透的阐释。论者视野开阔、理论储备丰富,尽管文章所论证的象征的意义没有脱离开常见的人物形象,但他能深入掘进,将人物放置到与时代的关系这一重大的命题中

去思考,揭示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众生相。同时,文章还从叙事学层面将《黄雀记》与《第七天》介入现实的方式及效果进行了对比,通过对一些词源的索解以及文本的言说内容,最终激赏了《黄雀记》介入现实的方式。房伟的《旧日的先锋与新貌的现实主义——论马原的长篇小说新作》^[18]探讨了马原的《纠缠》《荒唐》等,从马原对“遗产问题”的关注出发,指出马原“技法上向传统现实主义靠拢”,并由此解读了马原对现实的态度是“一种平静交流但有距离的‘和解’”。文章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论证合理,也为我们深入研究先锋作家如何介入“中国现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房伟的另一篇文章《“炸裂”的奇书——评阎连科的小说创作》^[19]着重从奇书模式与纯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炸裂志》的创作得失,对《炸裂志》极端化的寓言叙事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张军、周明全等人也对《秦腔》《第七天》《丁庄梦》的疯癫视角、亡灵视角进行了阐释。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但论者过于关注名家名篇,一方面难免造成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研究丧失了活力。

三 介入效果:叙事困境研究

客观而言,当下现实所蕴藏的丰富资源对于中国作家是一个巨大诱惑,但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挑战,因为当代未经沉淀,且正在行进当中,还持续发生着变化。无论作家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对现实发言还是只想迎头赶上这股潮流,若没有足够的艺术智慧来处理沉重的现实,那么介入就容易变得苍白或滑向虚无。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来看,它们在介入“中国现实”时确实存在一定的限度和困境,这也是研究者深深关切的。当新世纪文学走过整整十年的时候,《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组织了一场对话,较为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思了新世纪文学。反思之一便是“乏力的介入”^[20],批评家王尧、张清华、何言宏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对话。三位批评家均对娱乐化、商业化、新主流写作持怀疑和警惕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性写作”在介入现实方面的局限:“文学性写作”和娱乐化、商业化及新主流写作构成了某种妥协,这本质上导因于作家生活方式、思想情感、精神立场上的变化,甚至是背叛。作为怀着现实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一致认同文学需对现实进行介入的

理念后,他们提出了“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就此针对底层写作、王朔在 90 年代的痞子写作、《兄弟》的荒诞化与喜剧化写作进行了争鸣,并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介入的限度在于作家的思想能力和价值立场。这场对话参与者虽不多,但从讨论深度来看,无疑是一场精神盛宴。他们高度重视文学如何有效介入现实的问题,在批评之下彰显的是自身的风骨和良知。陈晓明的《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21]提出了“文学反映现实”包含的复杂意味,试图对“现实”及“现实性”等概念进行辨析,但最终答案是“定义‘现实性’并不容易”,“现实”同样如此。文章重点指出了“文学反映当下现实”时面临的挑战,尤其对当下作家过度“现实化”的现象提出质疑,并对在文坛引起争议的《那儿》《马嘶岭血案》等小说进行了针砭,论断发人深省、切中肯綮。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在介入“中国现实”时存在的问题多样,其中精神性缺失或不足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忧心,研究者们针对这一问题纷纷探幽发微、建言献策。雷达指出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迫切需要正面的价值声音”,因为在当下的诸多文本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22]这一见解相当犀利地道明了新世纪以来大量介入现实的长篇小说的弊病,颇有见地。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新疾旧患轮番上阵,作家应该正视问题,可以批判、否定中国现实,但不能始终“阴沉着脸看生活”,一味描摹甚至夸大黑暗和罪恶,导致通篇怨气弥漫、精神萎靡,在思想深度和审美方式上却乏善可陈。当作家将笔触纷纷转向对当下现实的挞伐时,也应扪心自问:这是否为自己切实的生活体验,是否过于极端化或空洞化,在介入现实的时候是否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表现力?穿过雷达的言语,他对当下文学的关切之心一览无遗,他提出的问题对作家的创作无疑是一种警醒和期待。谢刚在《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如何求得精神性》^[23]中也力求为这一问题支招。他在对现实主义追根溯源之后,以“真实性”和“批判性”作为对这类小说是否具有精神性的评价标尺,可谓抓住了研究命门;因为现实主义尽管是一个相当复杂混乱的理论语码,但不论从方法、思潮还是精神上来讲,“真实性”都是核心命题。这种“真实性”不是指内容必须真实发生,也不是说手法要绝对客观,而是指作家能拨开迷雾重重的现实面纱,发现当下种种时代症结的实质,不

歪曲和臆造现实。“批判性”更是举足轻重的问题,真正的作家直面现实的同时需对现实葆有警惕之心,在质疑和省察中促进社会进步。

既然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在介入“中国现实”时显示出种种弊病,那么有效的药方是什么呢?部分学者在论文中偶有提及,但未成系统。不过,青年学者金理在《面对“思想”与“中国经验”的呼唤:讨论开给新世纪文学的两种“药方”》^[24]中试图就此问题进行集中回答。金理援引胡风和别林斯基的话语,强调了在介入公共媒介事件或回应生活重大问题的文学中,要有“思想”的存在。在他看来,对于社会的尖锐问题,“文学应该表达出‘主动参与’的意愿”,但更重要的是以“文学的能力”展示文学独特的“发现、创见和想象”。不同于以往论者大而化之的空洞言论,金理紧扣文本《赤脚医生万泉和》,旁征博引,动用医学和心理学知识,跳出既定的研究框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肯定了范小青文学化处理现实的方式:“在小说独有的‘发现、创见和想象’中细腻地氤氲、流溢着‘地方感’。”通篇来看,论者的思维缜密、学养深厚,对新世纪的长篇小说而言,他开出的药方实属对症下药。同时,金理对《赤脚医生万泉和》的研究思路也为考察介入“中国现实”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切入视角,即对于触及公共事件或尖锐问题的小说来说,适当挣脱文学的藩篱,以社会学眼光来审视和关照或许能挖掘到独特内涵。然而,金理的研究仍存在拓展空间,在《赤脚医生万泉和》中,“地方感”的洋溢确实能体现范小青的审美能力,但这还是个案,我们可从这一文本中抽离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对作家如何获取“文学的能力”发表见解。

四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的突围之路

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对当前的“中国现实”进行了高度关注和深度介入,让“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再次飞舞,也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知识分子的情怀再度得到张扬,20 世纪 90 年代式微的文学公共性品质逐渐复苏。因此,关注和书写现实决不是简单的向新闻或热点题材靠拢的过程,直面现实的“硬写作”^[25]背后折射出的是新世纪以来作家与现实关系的变化,即中国社会当前急遽变化的现实影响和规约了作家的写作热情与精神立场。所以,对于这类具有极大文学史意义和社会学

价值的小说,我们理应抱以充分的关注和研究热情。综观研究现状,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评论视点逐渐走向多元化,研究视域越发开阔,尤其是在2004、2005年(“底层文学”思潮崛起)、2013年(精英作家集体直面新现实,长篇佳作联袂而至)等几个节点上,研究成果呈现欣欣向荣之景。研究者们从书写内容、介入方式、叙事困境等层面分析了不同作家的现实书写,但面对“介入现实”这样一个宏阔命题,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

首先,研究者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普遍缺乏“史”的眼光和追根溯源的精神。“现实主义”或者“介入现实”不是新近才出现的,而是绵延已久的问题,但在千帆过境般的研究格局中,鲜有学者真正以史学的眼光将这个问题放入文学史的长河中进行联系比较,以突出新世纪介入现实的长篇小说的独特性。因此,绝大多数研究只是拘囿于新世纪文学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无法判定这种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引进中国是在“五四”时期,尔后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经历了诸多的升降浮沉,无论是从方法还是精神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作为研究者,我们理应抓住几种现实主义思潮的重要向度进行剖析,比如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介入现实的小说的纵轴上,以书写内容、介入方法、现实态度、审美风格为基点,找出现实主义的流变过程,并追问此番变迁是由哪些因素共同导致的。在对现实主义文学流变的分析中,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回答新世纪介入现实的长篇小说给当代文学带来哪些变化和启示,具有何种独特性。从大的写作范围来说,新世纪书写现实的规模在“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里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时期,“底层文学”思潮及其他“类型化”写作思潮兴起,先锋作家集体“变法”、贴地飞行,“私人化”写作的女性作家面向公共现实。可以说,当今文坛的老中青几代作家都将目光对准了当下现实景观,即使是与文学公共性品质极为突出的30、50、80年代相比,新世纪的这种现实书写也毫不逊色。那么,作家在新世纪呈现出的浓郁的现实情怀和重心下移的现象是由哪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的呢?这除了与“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流变和内在生命力密不可分,还与作家的文学观念、创作心态、年龄有

何关系?处在社会转型期,这又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制度、市场、大众传媒、读者的审美趣味存在怎样的缠绕?这些都是要深掘的命题。从叙事学或作家精神学来说,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介入现实时呈现出多样的特点,如作者视点的下移和全球化视野的观照、作家对社会公共事件和公共生活显示出强势介入的主体立场、写实与荒诞手法并驾齐驱、“非常态”视角的盛行、多维空间的构造等。对于这些特点的展示,我们也应追溯根源。

从整理和爬梳可知,研究者在探究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时,念兹在兹的是作家介入的内容及方式,多是在主题学和叙事学层面滑行。当然,从作家精神学的角度来考量现实书写的成果也不匮乏,但仍存在待发展之处。比如何言宏、洪治纲等人的确重视作家精神学的勘探,他们关切的是文学制度、市场、大众传媒的合力如何造成了作家精神深处的疲软和现实表述的限度,侧重点还是叙事困境。其实,作家的精神学包括多个层面,就“介入现实”而言,对作家现实观的甄别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现实观制约着作家对现实的理解,关乎着他以何种方式介入现实,又呈现出怎样的价值立场。这一基本点却被多数研究者忽略了。从作家的自述及作品来看,新世纪的作家虽极有默契地把笔触伸向现实,但现实观不尽相同,比如阎连科奉行“超越的现实主义”(神实主义),毕飞宇坚持“还原的现实主义”,苏童始终“与现实保持三公里的距离”。这种现实观及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就构成了他们现实书写的区隔。另外,与90年代相比,作家们新世纪的现实观或多或少发生了更迭,每一次裂变背后都有复杂的原因,且伴随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看法。比如阎连科在提出“神实主义”之前,与现实主义存在着“依赖、疏离、纠结、背叛、决裂”的过程,这种深层转变折射出的是阎连科对今天的中国现实以及对“真实”的解读。

在作家精神学的问题中,另一个可深究的问题就是代际文化。我们始终在强调新世纪作家介入“中国现实”是一种集体姿态,从当前的在场作家来看,活跃在文坛的50、60、70、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拥抱现实、介入和书写自己的时代,且彰显出了异常鲜明的代际特征。关于这个问题,张柠等人在《2013年文学基本状况座谈会》^[26]一文中已初步提及“50后”与“70后”作家处理现实经验时的差别,代际研究的集大成者洪治纲则从

整体上探究了新时期以来的代际差异,张丽军、黄发有等人也对某一代际的作家进行了深挖;但是,他们的研究中一方面忽略或贬抑 80 后作家,一方面也没有系统阐释“介入现实”这个特定话题。其实,当把目光切向当下时代阵痛时,四代作家面对的是同样的写作资源和社会环境,不存在亲历者、旁观者、想象者的区别,或者说面对此问题时,作家们经验的多寡和记忆的盈缺造成的分野远没有回眸历史时那般突出;然而,代际差异并未就此消弭,比如在关注焦点、介入方式、叙事策略、现实情怀上依然呈现出不同风景,而同一代际的作家在现实书写上又存在某些共性。以代际作为一个视角去观察不同代际作家的现实书写,摒弃掉对书写对象的记忆、经验等因素的绝对干扰,在同一叙事维度上,更有助于探讨他们在精神立场、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长篇小说被誉为“大河”般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27]而书写当下现实更是一个难题,当长篇小说遇上“中国现实”,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对这个问题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尝试,也奉献出了不少具有实验意义的文本。但从现有的关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仍局限于特定作家作品的研究路数,而较少从整体上进行升华和总结,比如荒诞与写实的风格、叙事视角的探究都集中在单篇文本中。其实,新世纪介入现实的小说总体形成了“荒诞”与“写实”的两种叙事风格,这一点陈思和已指出。但研究者们对诸多作家在写实与荒诞间的转向却缺少深度追索,如林白、莫言、范小青、关仁山叙事风格的明显嬗变及背后价值立场的变化都值得探究,且林白、莫言等人还进行了几度转型。同时,“写实”手法在新世纪的复归也是极富意味的话题。就叙事视角而言,病残、儿童、亡灵、疯癫等“非常态”视角在介入现实的文本里集中出现,研究者们多着眼于《第七天》《秦腔》《丁庄梦》等单篇小说的分析,而少有将此类视角的盛行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来索解。我们应追问的是“非常态”视角何以在新世纪“介入现实”的小说中大量存在,它具有怎样的叙事功能和价值表述优势,引领了怎样的叙事风潮,又暗含哪些文化隐喻。

在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介入“中国现实”的得失进行客观评价后,针对存在限度,研究者们理应提

出可能性的出路。当前研究固然涉及此问题,但视野往往狭隘或只是隔靴搔痒。我们不妨结合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创作的审美标准,以世界经典现实主义作品为精神参照,从“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来探测突破困境的途径。在我看来,作家在现实的丛林中穿行,无论介入的心情多么迫切,都应冲破杂乱丛生的现实表象,沉潜到生活深处,以自身丰富的精神体验去唤醒一切的外在现实,令其真正复活。因为,尽管小说反映的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问题,但在言说时必须以个体经验为基础,否则就容易沦为缺乏温度与深度的文学,滑向公式化、模式化的深渊。也唯有触摸生活的细节之后,才能真正采取合适的文学方式去揭示生活本质,洞察现实真相,并呈现出诗意性的公共图景。应该说,以文学的方式介入“中国现实”拥有无数条路径,但不管选择哪一条,最不可或缺的即是精神立场和价值判断。价值立场的丧失导致的不是所谓的“客观”和“公正”,而是某种投机心理在作祟,本质上反映了作家思想的混乱、主体的萎缩抑或人格的软弱。伟大的作家在进行直抵人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时,不仅需要贴近现实和直面现实的勇气与魄力,更要带着警惕之心和质疑之态,如此,在对现实的“监管”和“督查”中方可烛照出现实的阴影和黑暗。当然,烛照阴影和黑暗并不意味着遮蔽或漠视现实的光亮,也就是说作家在对现实进行批判时,不能陷在铺陈丑恶和黑暗的泥淖里无法自拔,内心深处应该涌动着深厚的悲悯情怀和理想之光。正如沙特在“介入、揭露、改变”的思想链条上强调“否定性”和“建设性”是介入文学的双翼,在批判的溶液里从不缺“建设”的理想。谢有顺在《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里同样呼吁到: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鲁迅的憎恨后面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28]这就要求作家真正具备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以主动介入的姿态去探查和诊断时代病症,以诚挚的情怀去关注民生疾苦,像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那般,成为“中国社会的良心”,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立场,在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政治关怀中建构起一套坚实的价值评判体系。

参考文献:

- [1] 於可训. 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述评[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5): 98-102.
- [2] 贺绍俊. 新世纪十年长篇小说四论[J]. 文艺争鸣, 2011(7): 6-14.
- [3] 白 烨. 雄浑的现实交响曲: 2005 年长篇小说巡礼[J]. 小说评论, 2006(2): 4-8.
- [4] 葛红兵, 许道军. 介入·深入·反思: 2008 年文坛热点问题述评[J]. 探索与争鸣, 2009(1): 26-30.
- [5] 白 烨. 2013 年长篇小说: 直面新现实 讲述新故事[N]. 文艺报, 2014-01-29(02).
- [6] 岳 雯. 2013 年长篇小说: “现实”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N]. 文艺报, 2014-01-08(02).
- [7] 王春林. 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与表现: 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主题论[J]. 创作与评论, 2014(8): 5-12.
- [8] 周 蕾. 见证“疼痛”的写作: 论余华笔下的“中国故事”[J]. 当代作家评论, 2014(6): 123.
- [9] 陈思和.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5-12.
- [10] 朱水涌. 从现实“症结”介入现实: 以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近年创作为例[J]. 文学评论, 2007(6): 49-54.
- [11] 徐阿兵. 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事件化”倾向[J]. 文艺争鸣, 2007(10): 55-58.
- [12] 王 琮. 九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 以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2.
- [13] 郑莎莎. 华丽的先锋到朴素的现实: 毕飞宇小说论[D]. 西安: 西北大学文学院, 2013.
- [14] 韩松刚. 现实的“表情”: 论范小青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写作[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8): 129-137.
- [15] 傅书华. 卑微人生的关注: 读王祥夫的新世纪小说[J]. 小说评论, 2005(3): 53-56.
- [16] 伍 丹. “常人”化生存下的人性书写: 论王跃文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1(5): 1-6.
- [17] 徐 勇. 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 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J]. 文学评论, 2014(2): 108-115.
- [18] 房 伟. 旧日的先锋与新貌的现实主义: 论马原的长篇小说新作[J]. 当代作家评论, 2014(3): 133-137.
- [19] 房 伟. “炸裂”的奇书: 评阎连科的小说创作[J]. 文学评论, 2014(3): 98-105.
- [20] 王 尧, 张清华, 何言宏. 乏力的介入: “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之一[J]. 上海文学, 2011(1): 106-112.
- [21] 陈晓明. 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 [J]. 文艺研究, 2012(12): 26-34.
- [22] 雷 达.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 一个发言提纲[J]. 南方文坛, 2006(1): 38.
- [23] 谢 刚. 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如何求得精神性[J]. 长城, 2009(11): 139-142.
- [24] 金 理. 面对“思想”与“中国经验”的呼唤: 讨论开给新世纪文学的两种“药方”[J]. 小说评论, 2010(5): 10-17.
- [25] 王 湛, 阎连科. 作家要对现实做正面回答, 哪怕一次[N]. 钱江晚报, 2013-11-05(02).
- [26] 张 柠. 2013 年文学基本状况座谈会[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4(1): 32-42.
- [27] 吴义勤. 关于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热”的思考[J]. 南方文坛, 2009(5): 33.
- [28] 谢有顺. 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 谈新世纪小说[J]. 文艺争鸣, 2008(2): 27-28.

责任编辑: 黄声波